



野生动物保护“着陆何处”？ ——基于“细嘴杓鹬灭绝事件”的讨论

吴海朝¹，孔令昊²

(1. 吉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吉林 长春 130118; 2.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细嘴杓鹬于 2024 年宣布全球性灭绝，让人类意识到生态系统的复杂而脆弱，同时也引发了国际层面对于野生动物保护的讨论。“细嘴杓鹬灭绝事件”的复杂性使其具有“超物体”属性。目前有关细嘴杓鹬的相关言论分为三类：有人质疑学术界针对细嘴杓鹬的研究是不是必要的；有人将其灭绝的原因完全归咎于人类保护不力；还有人认为细嘴杓鹬完全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人类就不应该干涉自然选择。上述观点简化了问题的复杂程度，有可能使野生动物保护行动脱离“在地”视角。野生动物保护从不只是一个科学问题，其“超科学性”如果不能被很好地揭示出来，则相关行动难免会流于形式而无实际意义。相关行动不该以片面的观点寻求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而必须在各种“视角”的交互中进行多方讨论。

关键词：细嘴杓鹬；野生动物保护；跨学科研究；社会认知

收稿日期：2025 年 12 月 22 日

中图分类号：Q-9

通讯作者：吴海朝，吉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Why Should Wildlife Conservation "Down to Earth"?——Discussion Based on Extinction Event of *Numenius tenuirostris*

WU Hai-chao¹, KONG Ling-hao²

(1. Jil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Plant Protection, Changchun, 130118; 2.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global extinction of *Numenius tenuirostris* was announced in 2024, which made humans realize the complexity and fragility of the ecosystem and also triggered discussions on wildlife protec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The complexity of the “*Numenius tenuirostris* Extinction Event” gives it a “hyperobjects” attribute. At present, relevant comments about *Numenius tenuirostri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some people question whether the academic community’s research on *Numenius tenuirostris* is necessary; some people attribute the cause of its extinction entirely to human ineffective protection; and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Numenius tenuirostris* is entirely the result of natural selection, and humans should not interfere with natural selection. The above views simplify the complexity of the problem and may cause wildlife protection actions to deviate from the “local” perspective. Wildlife protection has never been just a scientific issue. If its “super-scientific” cannot be well revealed, related actions will inevitably become a formality withou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Related actions should not seek a one-off solution from a one-sided point of view, but must be discussed in multiple ways in the interaction of various “perspectives” .

Keywords: *Numenius tenuirostris*; Wildlife Conservatio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Social cognition



一、引言——“细嘴杓鹬灭绝事件”的“超物体”属性

细嘴杓鹬 (*Numenius tenuirostris*) 是一种能够长途迁徙的海滨滩涂候鸟。其最早的目击报告是由意大利旅行家马西里 (Marsili) 伯爵提供, 他于 1682 年至 1683 年间在巴尔干地区的多瑙河流域发现该鸟类, 并于 1726 年发表了相关报告。然而, 关于细嘴杓鹬的精确数据采集却是在 1840 年以后才逐步开展, 该鸟类在那时已被认为濒临灭绝, 并被列入多国保护动物红色名录中^[1]。西伯利亚 (Siberia) 地区是公认的细嘴杓鹬栖息地之一^[2]。该鸟类最后一次被发现筑巢是在 1924 年的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 (Omsk) 地区^[3]。1994 年, 《保护迁徙野生动物物种公约》(Convention on Migratory Species, 又称《波恩公约》[Bonn Convention]) 将细嘴杓鹬列入备忘录。1998 年, 博埃尔 (Boere) 团队发表的考察报告指出, 鄂木斯克地区的过度放牧和地形改变等因素导致了细嘴杓鹬在该地区的消失^[4]。2001 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欧洲的细嘴杓鹬可能已经不足 50 只, 造成其生存危机的因素除了狩猎活动外, 还有可供繁殖的栖息地的萎缩^[5]。同年, 巴切蒂 (Baccetti) 通过对 19 世纪相关画作的分析, 推测细嘴杓鹬在长途跨海飞行后不一定会选择食物丰富的岛屿降落^[6]。这可能也是导致该鸟类濒临灭绝的原因之一。2002 年, 有研究详细描述了细嘴杓鹬幼年个体和成年个体的羽毛特征, 但研究者也悲观地表示, 想要研究其活体是几乎不可能的^[7]。至 2010 年, 学术界已有宣称细嘴杓鹬灭绝的研究报告, 尽管后续中东地区陆续有目击报告, 但皆无法得到证实或需要重新评估, 因此相关结论殆无异议^[8]。2011 年, 细嘴杓鹬被从“捷克共和国鸟类名录”中删除^[9]。2018 年, 相关研究者分析了细嘴杓鹬的骨骼数据, 并试图寻找适合该鸟类的繁殖场所, 其结果指出: 细嘴杓鹬的相关繁殖地存在较大局限性^[10]。2019 年, 研究者通过线粒体基因组分析, 确立了细嘴杓鹬的分类地位, 但细嘴杓鹬可能早已灭绝^[11]。2022 年, 研究者通过研究细嘴杓鹬的蛋本来推测其繁殖地, 所得结果与先前的研究基本吻合^[12]。2024 年, 细嘴杓鹬正式宣布全球性灭绝, 相关文献推测其确切灭绝时间为 1995 年目击事件发生后

不久^[13]。

“细嘴杓鹬 (*Numenius tenuirostris*) 灭绝事件”在漫长的生物演化长河中并不罕见。当下, 物种灭绝正在史无前例地加速, 以至于相关现象被称作“第六次大灭绝事件” (The Sixth Extinction)、“全新世灭绝事件” (The Holocene Extinction) 或“人类世灭绝事件” (The Anthropocene Extinction)^[14]。这引发了国际层面的普遍反思。“第六次大灭绝事件”让人类认识到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脆弱性。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稳定运行的基石, 而“作为生态链条重要环节”的物种之灭绝会破坏并中断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 影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并产生一系列连锁效应。物种灭绝也使得一些可能存在科研潜力的关键基因逐渐消失, 而这些关键基因对于人类医药、农业、工业等领域的未来发展都有可能产生潜在的影响。就这一层面而言, 物种灭绝事件也促使科学工作者们尽快建立基因库并推动生物技术的发展。此外, 科学工作者们同样关注人类活动对气候环境以及濒危物种栖息地所施加的影响, 讨论人类影响地球自然平衡的方式, 为减缓生态危机而努力。可以说, 在自然科学领域, “研究濒危或已灭绝物种”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自然拯救行动”。而从人文学的角度出发, “第六次大灭绝事件”使得人类重新审视自身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并进而挑战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叙事, 提出了“人”与“非人”和谐共生的环境伦理问题。相关问题引发了研究者们对生命存在价值的反思: 是否所有生物都应享有存在的权利? 我们当代人是否对未来世代的子孙们负有环境伦理责任? 这些责任具体表现为哪些范畴? 这些深刻的伦理问题是研究者们对科学研究以及技术发展所产生之影响的盛大讨论。

上述讨论展现了“细嘴杓鹬灭绝事件”的“超物体” (hyperobjects) 属性。“超物体”概念源自蒂莫西·莫顿 (Timothy Morton), 指的是相对于人类而言, 在时空量级上有着巨大分布的物, 如全球变暖、温室效应、黑洞、油田、生物圈、太阳系、龙卷风、海啸, 甚至化学元素、苯乙烯泡沫塑料、种族、阶级或资本主义轰鸣的机器等都是“超物体”的化身。时空无限性是“超物体”最为显著的性质, 这意味着人类无法对其进行完全掌握, 而只能求



助于统计等手段^[15]。正是由于这一事件的复杂性，目前有关细嘴杓鹬的相关言论在笔者看来未免都显得片面且独断。有人质疑学术界针对细嘴杓鹬的研究是不是必要的；有人将其灭绝的原因完全归咎于人类保护不力；还有人认为细嘴杓鹬完全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人类就不应该干涉自然选择。上述观点无疑都极大简化了问题的复杂程度，其所引发的恶劣后果，将使得野生动物保护事业轻率地盲信某一自称“科学”“真理”“权威”的解释与建议，不去考虑实际操作的复杂性与相关保护事业所牵连的“社会·文化”诸领域，从而“离地而起”，成为一座没有根基的“空中花园”。而笔者在本文中所要进行的工作——化用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话说——恰恰是反思上述言论背后所体现的“存在论”（ontology）基础，从而思考野生动物保护究竟应该“着陆何处”（Où atterrir?）。

二、“迟来的研究”——细嘴杓鹬跨学科研究之必要性

有关细嘴杓鹬的研究具有滞后性。“该鸟类已灭绝”的讯息传到中国之后，并没有引起社会大众足够的关注，其原因可能有两种：其一，细嘴杓鹬在中国没有分布，大众对于该鸟类几乎没有相应的认知；其二，细嘴杓鹬是濒危物种里经常提及的“常客”，对于社会大众而言，和它“失联”才是常态，这种认知惯性导致细嘴杓鹬的灭绝并不是什么重大新闻。因此，如今细嘴杓鹬被宣布灭绝，反而更像是对于其早已消失之事实的盖棺定论。但这并不代表已经灭绝的细嘴杓鹬不再具有研究价值，即使在已经没有活体可供调查的情况下，研究者们依然通过勘探、标本、历史记录、分子生物学等研究手段，尽可能模拟出了细嘴杓鹬的越冬地、繁殖地、迁徙路线，并确定了细嘴杓鹬的分类学地位。

有人会说，该物种已经灭绝了，这些迟来的研究已经于事无补，并不能改变细嘴杓鹬的结局。但这种说法并未考虑到相关研究对于未来动物保护事业的参考价值。即使研究的物种已经灭绝，但其曾经面临的生存困境，可能是其它濒危物种同样需要面对的。获取细嘴杓鹬灭绝的细节来由，除了是对已逝物种的纪念以及对人类的警醒外，也

是认知尚存物种的重要科学依据。当前科学研究远不能描述研究对象的完整信息，能做到的只是在当前所具备的条件下“模拟”并“部分·描绘实在”（mero-graph reality）。细嘴杓鹬的灭绝无法用“一条线索”就可以完整界定，描绘其存活期间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后续结局出现的原因，甚至包括相关理论概念的修改与消亡，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在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当今世界，末世的可能性不会不对人类学和形而上学产生影响^[16]。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末世论引发了学术界与社会大众对人类存在之终极意义的思考，促使人类对生态危机以及人类所应承担的伦理责任进行反思，强调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末世论揭示了存在与虚无的关系，挑战传统形而上学关于存在的定义，提出虚无与创造之间的动态关系，探讨时间与永恒的哲学，重新定义时间的意义，将其视为通向永恒的桥梁，而非线性发展的过程。它强调自由与创造，探讨了个体在终极危机中实现自我超越的过程。物种灭绝事件不仅仅是保护野生动物的问题，它也与经济、技术等领域的发展息息相关。人类对于细嘴杓鹬的认知在科学技术介入之前一直处于一种“遮蔽”状态，正是这些迟来的研究让人类得以“解蔽”细嘴杓鹬的相关信息及其灭绝的原因，并将相关经验与教训类推至其它濒危物种的保护措施之上，从而完善自身对动物、环境保护的认知与理解。就这一点而言，对于细嘴杓鹬的研究尽管是“迟来的”，但绝不是没有价值的。

综上所述，笔者解释了相关研究的意义与必要性。既然这种“迟来的研究”是必要的，则相关科学工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具备以下三种意识：

其一，研究者需要接受偶然性的存在。科学研究不可能完全揭示客观实在。科学研究所发现的“实在”是由一系列偶然事件互相作用并予以呈现的，即：研究者恰好在某时某刻得到了某些具有一定“特征”的数据，并通过恰到好处地总结与归纳，将研究结果“呈现”出来。由此不难看出，科学研究和人类活动并非完全分割的。一个科学理论模型的成功，往往在于其有效性，而并非因为其完全为“真”。科学理论并不是现实的反映，而是一种假设。科学家往往是先“俗成”了一些理论，



再通过反复地验证去回溯性地建构科学研究的“约定”。因此，那些认为“科学研究就是揭示‘客观现实’”的看法，实在是独断且庸俗。

其二，研究者需要注重相关研究的多“视角”切入。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抓住相关研究问题中可以梳理的、有逻辑的“共性”，探究这种“共性”产生的条件，由此产生的研究成果与研究范式或多或少都能为其他类似的研究提供帮助。细嘴杓鹬作为一种候鸟，与其亲缘关系接近、行为模式类似的物种并不在少数。研究者们研究这类物种的成果——如研究大滨鹬（*Calidris tenuirostris*）、中杓鹬（*Numenius phaeopus*）、爱斯基摩杓鹬（*Numenius borealis*）的成果^[17]——都可以为科学家研究细嘴杓鹬提供解释问题的工具。此外，研究细嘴杓鹬的“视角”也并不局限于自然科学，人文社科的相关理论也可以提供不同的研究“视角”。保罗·克鲁森（Paul J. Crutzen）与尤金·斯托尔默（Eugene F. Stoermer）于2000年提出了“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作为一个新的地质年代^[18]。尽管这个概念存在争议，但它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使得人类开始重新定义全球环境问题，认为其应对之策不能局限于自然本身，而应该囊括人类社会自身^[19]。乔·莫兰（Joe Moran）指出，文化地理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新观点在生态批评领域中往往会与人文学科相结合^[20]。“人”与“非人”长久以来相互纠缠、互相影响，“共生”的要求越发强烈。人类学领域也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多物种民族志”（multispecies ethnography）的书写潮流，开始更多地关注“非人”在生态问题中的影响，这种思潮对于当代生态问题具有理论诉求和现实意义。善用这些理论工具与多元视角，我们才能更加深入地认识世界。

其三，研究者需要秉持更加包容、开放的科学态度。约翰·诺顿（John D. Norton）的“穹顶”（the dome）假说挑战了决定论根基，“宏观世界的一切都可以被描述、推演并被确定”^[21]的思想似乎不再牢不可破。虽然该假说后来被认为顶端导数无意义，但其带来的余震依旧令人震撼。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提出的“测不准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使得物理量需要用概率来表述，但这些概率却是由“薛定谔方程”（Schrödinger equation）确定的。换言之，其不确定性是被确定

的，这是一种“混沌理论”（Chaos theory）的思路。当然，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所提出的“超混沌”（hyperchaos）思路揭示了一种“超偶然性”（super-contingency）：如果说“混沌”的“偶然性”意味着事物的永恒生成，那么“超混沌”的“偶然性”（或者说是“超偶然”）则意味着一切都有可能被摧毁。因此，“超混沌”的“偶然性”不再指代“无秩序的必然性”，而是指“秩序与反秩序”“生成与永恒”之平等的偶然性^[22]。由此可见，一项理论并不能永恒地保持所谓的“真理”地位，它需要经过接受、回应、适应、转变等一系列的验证过程。然而，科学很多时候是超越常识的，思考科学问题不能受限于经验，因此我们需要意识到，一个宏大的、能引发思考的理论模型很可能对社会大众的“常识性认知”产生冲击，所以不能指望相关理论模型容易被理解，也不能假定真正具有创造性的科学理论会符合学术界主流认识。杨振宁指出，“每个人在每一个时刻都有一些直觉，这些直觉多半是正确的，可是也有一些需要修正，需要加入一些新的观念，变成新的较正确的直觉，我从而了解到，一方面直觉非常重要，可是另一方面又要能及时吸取新的观念修正自己的直觉”^[23]。这也是反对“霸权”式科学研究、走向多学科与多层次研究合作的必要认知，它能可促成各学科在“学科边界”合作的可能，形成科学与社会的有机结合。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提到了开放和重建社会科学，提倡多学科、跨学科研究^[24]。受制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知识生产者研究范式的变化，这条道路注定是困难重重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布的《UNESCO科学报告》中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国际层面，不同学科的研究者进行跨学科合作研究的趋势越发明显。但只要“学科”依旧存在，这种将某一具体问题拆分进不同学科中的“独立建筑”式构架就会始终存在。所以笔者才会在此呼吁“模糊学科边界”，以此作为突破口，寻找跨学科合作的可能性。

三“被怪罪的最后一根稻草”？——“细嘴杓鹬灭绝事件”的社会认知

从气候变化到生物多样性被破坏、全球疫情



以及自然灾害,这些危机与挑战都是复杂且相互关联的。这需要研究者们进行跨学科合作,但正是因为“细嘴杓鹬灭绝事件”作为“超物体”的复杂性,使得人类无法对其产生直观,只能求助于统计学方法,且相关科学研究必然有“非实证”(基于逻辑推导)、“非全”的特征,这无疑增加了社会认识相关问题的难度,造成了社会群众对“细嘴杓鹬灭绝的原因”这一问题出现了两种看上去截然相反的认知。

关于细嘴杓鹬灭绝一事,公众言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类型:

(1) 一些人分享了他们曾经见过类似鸟类的经历,或者描述了他们对细嘴杓鹬的印象。这类言论往往带有个人情感色彩,表达了对这种鸟类的怀念。

(2) 许多人将细嘴杓鹬的灭绝归因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例如:湿地消失、过度捕猎等)。这类言论通常还会用其他成功保护濒危鸟类的案例(如朱鹮复苏的奇迹)来对比,说明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3) 一些人则认为物种灭绝是自然选择的一部分。尽管对细嘴杓鹬的消失感到惋惜,但他们认为这是生态系统演化的自然结果,物种的灭绝自有其规律,人类不应该干涉。

这些观点反映了人们对生态危机的不同态度,也揭示了在面对物种灭绝时,人类的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复杂交织。上述这三类言论都有合理的出发点。第一类言论分享科学知识,可以在科学传播中激发公众兴趣,但相关论述很多时候缺乏确切可靠的数据和严谨的逻辑推导。第二类言论指出了“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现象,但需要将主张转化为数据驱动的分析,以探索哪些保护策略最有效,以及推动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第三类言论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但存在将问题过于简化的嫌疑。在科学领域,物种灭绝现象往往需要结合生态压力、环境胁迫、生理活动、行为趋势、人类活动等要素进行具体分析。自然选择确实在物种的长期演化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但现代人类社会对相关物种所施加的种种影响往往加速其灭绝过程,单纯依赖“自然选择”理论来解释物种灭绝问题无疑忽略了人为因素造成的深远影响。

第一类言论属于单纯的经验类分享,往往不会引起他人的厌烦。但即使是这样,此类言论也会被“反KY”人士抨击。“KY”源于日语“空気読めない”,意为“不会察言观色”,通常指在人际互动中不懂得顾及他人感受或者不合时宜的行为。“反KY”可以理解为一种对不顾社交场合、不懂得换位思考或破坏气氛行为的抵触。然而,很多时候“KY行为”并非有意为之,“反KY”现象会变得有些过头,甚至变成一种趋势或“刻板标签”,在实际讨论中对任何稍微有点“出格”或不符合大众期待的行为不加区分地进行批评。如果“反KY”变成了一种单方面的指责,或者过于追求迎合社交规则,反而会影响有关“细嘴杓鹬”以及该物种灭绝事件的知识科普与知识传播。当然,“KY”与“反KY”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这里不再赘述。

第二类和第三类言论体现了大众对“细嘴杓鹬灭绝原因”的不同看法,可以说是“被怪罪的最后一根稻草”之争:一方认为是人类活动导致自然的破坏,所以“细嘴杓鹬灭绝”应当是人类全责;另一方认为“细嘴杓鹬灭绝”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物种不能适应自然规律而导致种群灭绝,与人类无关。那么“自然”与“人类”究竟哪一方才是导致细嘴杓鹬灭绝的“最后一根稻草”呢?事实上,这两种看法都是“阿卡狄亚”(Arcadia,或称“田园主义”)态度^[26]的延伸与变体,“阿卡狄亚”态度既是一种反思,也是一种愿景,在快节奏、技术驱动的现代社会中,该态度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自然的价值,关注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寻求共存和持续发展,因而常被引申到环境保护和生态学研究之中。

第二类言论往往强调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责任,这与“阿卡狄亚”的核心精神一致:人类应尊重大自然,将自然视为需要保护的乐园。这类言论中最多的是将细嘴杓鹬灭绝对比“朱鹮奇迹”的出现,强调人类在这件事情上的保护不力。更为激进的言论认为,如果细嘴杓鹬分布在中国,就能避免灭绝的命运。诚然,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非常严格,且在历史上存在着各种保护成功的案例,如:大熊猫、金丝猴等。这证明我国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较为全面地保护。但这种说法存在潜在的逻辑谬误。即便细嘴杓鹬的栖息地部分在中国,但仅仅有栖



息地并不代表它们的生存能够得到保障。栖息地需要具备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食物资源、水质资源、植被资源等,如果这些条件不足,即使有栖息地,物种的生存也可能无法维持。此外,细嘴杓鹬是一种迁徙性鸟类,它们的生存需要多个区域之间的生态系统共同支持。如果任何一个关键节点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就会对整个迁徙过程造成影响。所以仅仅保证某一个地方的栖息地并不足以解决它们濒危的问题。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等动态因素也是需要考虑的,不能假定某一处的栖息地存在就能保护该物种。细嘴杓鹬的灭绝不仅仅是单一地点的问题,而是全球生态的复杂问题,不同国家的生态保护措施、政策能否协同合作,对物种保护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故此,“细嘴杓鹬分布在国内就能免于灭绝”的推论实在是过于儿戏。这里不得不提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方法。这种保护方法根据保护地分为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对于像朱鹮那样的几乎不长途迁徙的留鸟,自然可以根据这一重要特性因地制宜,但上述两种保护方式都很难做到对候鸟(或者说长距离迁徙物种)的全程有效保护。笔者举出对君主斑蝶(*Danaus plexippus*)的保护案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其成功之处在于“对君主斑蝶迁徙路径的深入研究”“保护栖息地的国际合作(君主斑蝶迁徙路线经过加拿大和美国,其越冬地则在墨西哥)”以及“社会长期关注”,通过保护君主斑蝶的关键越冬地和迁徙停歇地使其种群得以恢复^[25]。然而,细嘴杓鹬的灭绝则反映了保护候鸟的复杂性,和君主斑蝶的例子有显著区别。细嘴杓鹬的繁殖地、迁徙路径和越冬地分布广泛,且涉及相当多的国家和地区,协调保护行动的难度极大。此外,对细嘴杓鹬的生态习性了解不足,也导致保护措施难以有效跟进。前文业已提及,细嘴杓鹬在长途跨海飞行后不一定会选择食物丰富的岛屿降落^[26],其自身习性也为种群繁衍带来了相当大的隐患,这恐怕不能只归咎于人类保护不力。

第三类言论更关注物种对于环境的适应性,这种思路或许体现了一种更“科学主义”的态度,即:自然独立于人类而存在。这事实上仍然没有摆脱“阿卡狄亚”态度的影响。不同于第二类言论强调“人类活动破坏了‘田园牧歌’式的自然”,

这类言论则强调“人类活动不该介入独立的‘自然’”。换言之,“人”这种在“自然”中至关重要的哺乳动物依然被排除在“自然”之外。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人类独有的文化和技术使得自己在自然界中获得一种独特的地位。通过农业活动、工业科技等,人类已经对地球生态系统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人为选择或文化选择的介入,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自然选择的传统框架,足见“人类活动”也是物种灭绝事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在细嘴杓鹬灭绝事件中,虽然存在“该鸟类迁徙、繁殖条件苛刻”等自然因素,但也应当看到人类活动改变地形、压缩其生存空间的事实。人类凭借技术、智慧和社会组织能力,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对自然环境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而这种改造速度远远超过自然界自身演化和恢复的时间尺度。自然的恢复与物种的演化动辄需要千百万年的时间,而人类的活动常常在数十年内改变、破坏甚至重建一个生态系统。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亚马逊雨林的开发生态环境的影响:雨林被迅速清除以种植大豆和放牧牲畜,短短50年间,大约17%的亚马逊雨林已经被人类活动影响,这种速度远远超过森林自然生长和生态恢复的能力^[27]。因此,坚持排除“人”之因素的“自然”观,而不去追问“人”与“非人”的共生关系,这种认知实在算不上高明。

从上述论述不难看出,两种观点的存在论基础是相同的,均将“人”外置于“自然”,与其说这是“最后一根稻草”之争,倒不如说是两种极端思想的碰撞。在“非现代”的科学研究中,我们要秉持的恰恰是一种“盖娅”(gias)观^[28],这种思考与传统的“阿卡狄亚”态度产生了鲜明的对比,是对“自然—人类”对抗性二分法的一种反思。灭绝事件不仅是科学意义上的讨论,还牵涉到哲学、人类伦理以及未来发展的深刻思考。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29]。这恰恰说明了“现代”科学“将‘人’驱逐出‘自然’”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我们需要通过反思“现代”科



学这柄双刃剑,重新构建“人”与“非人”的关系,并以此为契机重新审视科学研究与社会活动的关系,推动“模糊边界”的跨学科对话与多元“视角”的运用,以获得解决科学与社会发展过程中难以应对之复杂问题的新思路。霸权式的“现代”科学往往倾向于忽视价值观、文化和伦理的多样性,将科学技术作为唯一真理,这种单一化的视角无疑简化了相关问题的复杂性。我们需要正视事物存在的“不确定性”与“偶然性”。在今后保护类似于细嘴杓鹬的濒危物种的行动中,我们既不能对其不闻不问,也不能对其过度控制,而需要摸索一种适度的保护措施。

四、结语——野生动物保护的“着陆”

野生动物保护从不只是一个科学问题,其“超科学性”如果不能被很好地揭示出来,则相关行动难免会流于形式而无实际意义。换言之,野生动物保护不只是“实验室科学”那么简单,它需要参与者去积极采取行动并进行实地调研,这不可避免地会与“人”打交道。当地人怎么看待相关的野生动物保护计划?政府之间该如何紧密合作以确保计划的实施?如此种种的问题,都需要参与者在行动的过程中去发现并尝试解决。事实上,我们对于野生动物保护的认知常常会陷入一种过分两极化的模型之中——一种“加害者—受害者”或“受益者—损失者”的二元结构。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将“人”排除出“自然”,并力图让“科学”的“可度量性”成为审视任何事物的尺度。但我们在具体实践中会发现:越是执着于将“人”排除出“自然”范畴,就越会发现“人”与“非人”相互将对方折叠进自身之中;越是执着于赋予世界“可度量性”(scalability)的“尺度”(scale)^[30],就越会发现这个世界充斥着“非可度量性”(nonscalability)成分。长此以往,我们难免陷入一种“思维中毒”的糟糕状态。由此看来,我们所要做的前置工作不是讨论哪种野生动物保护的认识最为“科学”,也不是将问题盲目简化,而是需要先治疗自身的思维疾病:一种“自然—社会·文化”二元对立式的“现代”思维顽疾。

野生动物保护的参与者与“现代”科学很多时候并未将人类视为“自然”的一部分。既然我们不在“自然”之内,那我们在哪儿?在真空中吗?

拉图尔在《面对盖娅:新气候体制八讲》中引用了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提出的“球体学危机”(sphereological)来生动地论述这一思维疾病。事实上,这也是每一位野生动物保护的参与者需要去思考的问题:“你人在哪里?你如何受到保护,免于灭绝?你呼吸怎样的空气?你怎样取暖,怎样穿着,怎么进食?如果你无法满足这些生命基本需求,你怎么会仿佛站在道德高位,怎么会一直想要谈论真实和美好?你试图捍卫的价值有怎样的空调系统?”^[31]在谈论环境问题与野生动物保护行动时,我们不应该忘记自己也处于“自然/社会/文化/政治”的环境中。没有这样的自觉,不去直视这样的现实状况,则“环境保护”与“野生动物保护”无从谈起。野生动物保护“着陆何处”?笔者的答案是:相关参与者应当“栖居于大地之上”(Habiter la Terre),唯有如此,方能在“人”与“非人”互动的复杂网络中发现野生动物保护的“着陆”之处。我们需要调查、拆解并重新描述我们自己与其他“存在”所构成的地理景观,并列“在地者”们准备捍卫的东西^[32]。我们不该以片面的观点寻求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而必须在各种“视角”的交互中进行多方讨论。身中“现代”思维之毒而将野生动物保护问题过于简化,将无法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 [1] D. Nankinov. "Sightings of Slender-billed Curlew (*Numenius tenuirostris*) Vieillot, 1817 in the Balkan countries". Wader Study Group Bulletin, 1991 (1), pp. 24 - 32.
- [2] J. Bojko, E. Nowak. "Observation of a Slender-billed Curlew (*Numenius tenuirostris*) in West Siberia". Wader Study Group Bulletin, 1996 (1), pp. 20-21.
- [3] J. J. Hudecek. "Probable historical record of the Slender-billed Curlew (*Numenius tenuirostris*) in the Czech Republic on the Moravian-Silesian territory". Acta Musei Silesiae: Scientiae Naturales, 2017 (3), pp. 281 - 287.
- [4] G. C. Boere, A. K. Yurlov. "In search of the Slender-billed Curlew (*Numenius tenuirostris*): Preliminary results of an expedition to wetlands and waterbirds of the Baraba and Karasuk Steppe in the south of West Siberia, Russian Federation, 17 May-22 June 1997". Wader Study Group Bulletin, 1998 (1), pp. 35 - 38.



- [5] U. Gallo-Orsi, G. C. Boere. "The Slender-billed Curlew *Numenius tenuirostris*: Threats and conservation" . *Acta Ornithologica*, 2001 (1), pp. 73 - 77.
- [6] N. Baccetti. "19th Century Portrait of a Hunter with a Slender-billed Curlew *Numenius tenuirostris*" . *Wader Study Group Bulletin*, 2001 (1), Article 17.
- [7] M. Zenatello, L. Serra. "Ageing Slender-billed Curlews *Numenius tenuirostris*: A useful tip" . *Wader Study Group Bulletin*, 2002 (1), Article 14.
- [8] G. M. Kirwan, R. F. Porter, D. A. Scott. "Chronicle of an extinction? A review of Slender-billed Curlew records in the Middle East" . *British Birds*, 2015 (11), pp. 669-682.
- [9] J. J. Hudecek. "The Slender-billed Curlew (*Numenius tenuirostris*) in Bohemia" . *Acta Musei Silesiae: Scientiae Naturales*, 2020 (3), pp. 185 - 188.
- [10] G. M. Buchanan, A. L. Bond, N. J. Crockford, J. Kamp, J. W. Pearce-Higgins, G. M. Hilton. "The potential breeding range of Slender-billed Curlew (*Numenius tenuirostris*) identified from stable-isotope analysis" . *Bird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2018 (2), pp. 228-237.
- [11] F. S. Sharko, S. V. Tsygankova, V. I. Glazko. "Phylogenetic position of the presumably extinct slender-billed curlew, *Numenius tenuirostris*" . *Mitochondrial DNA Part B*, 2019 (2), pp. 2675-2677.
- [12] A. L. Bond, G. M. Buchanan. "Eggs of the 'lost' Slender-billed Curlew (*Numenius tenuirostris*)" . *Bulletin of the British Ornithologists' Club*, 2022 (4), pp. 480-486.
- [13] G. M. Buchanan, B. Chapple, A. J. Berryman, N. Crockford, J. J. F. J. Jansen, A. L. Bond. "Global extinction of Slender-billed Curlew (*Numenius tenuirostris*)" . *Ibis*, 2024 (4), pp. 1012-1025.
- [14] 侯焱臻、赵文武、刘焱序著：《自然衰退“史无前例”，物种灭绝率“加速”——IPBES 全球评估报告简述》，《生态学报》2019年第18期，第6943—6949页。
- [15] Timothy Morton. *The Ecological Though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16] V. Hildebrandt. *Die Krise der Gegenwart und die Verantwortung der Philosophie: Transzendentalpragmatik, Letztbegründung, Ethik*. München: C.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997.
- [17] J. Smith, K. Lee. "Tracking the full annual-cycle of the Great Knot *Calidris tenuirostris*, a long-distance migratory shorebird of the East Asian-Australasian Flyway" . *Journal of Avian Studies*, 2025 (4), pp. 145-162.
- [18] (英) 杰里米·戴维斯著：《人类世的诞生》，张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 [19] "The Anthropocene: IUGS-ICS Statement" . [2024-11-26] . https://www.iugs.org/_files/ugd/f1fc07_ebe2e2b94c35491c8efe570cd2c5a1bf.pdf?index=true.
- [20] (英) 乔·莫兰著：《跨学科：人文学科的诞生、危机与未来》，陈后亮、宁艺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188页。
- [21] J. D. Norton. "The Dome: An Unexpectedly Simple Failure of Determinism" .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08 (5), pp. 786-798.
- [22] Quentin Meillassoux. *Time Without Becoming*. edited by Anna Longo. Milan: Mimesis International, 2014, p. 25.
- [23] 杨振宁著：《杨振宁九十自述：我的学习与研究经历》，清华大学校史馆，2012年，访问时间：2025年4月15日，来源：<https://xsg.tsinghua.edu.cn/info/1004/1823.htm>.
- [24] (美) 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06页。
- [25] K. E. Spaeth Jr, C. J. Williams, R. A. Moranz, C. Taliga, W. A. Rutherford, B. Simpson. "Preferred nectar sources for the monarch butterfly (*Danaus plexippus*) along the Great Plains migration pathway" . *Ecosphere*, 2025 (2).
- [26] N. Baccetti. "19th Century Portrait of a Hunter with a Slender-billed Curlew *Numenius tenuirostris*" . *Wader Study Group Bulletin*, 2001 (1), Article 17.
- [27] E. L. Bullock, C. E. Woodcock, C. Souza, P. Olofsson. "Satellite-based estimates reveal widespread forest degradation in the Amazon" . *Global Change Biology*, 2020 (4), pp. 2956-2969.
- [28] Lucas Pohl. "Ruins of Gaia: Towards a Feminine Ontology of the Anthropocene" .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20 (0); Caitlin DeSilvey, Tim Edensor. "Reckoning with ruins" .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3 (4), p. 477.
- [29] (德) 弗雷德里希·恩格斯著：《自然辩证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13—314页。

[30] Anna Lowenhaupt Tsing. “On Nonscalability: The Living World is Not Amenable to Precision-nested Scales”. *Common Knowledge*, 2012 (3).

[31] (法)布鲁诺·拉图著：《面对盖娅：新气候体制八讲》，陈荣泰、伍启鸿译，中国新北：群学，2019年，第193—194页。

[32] (法)布鲁诺·拉图尔著：《着陆何处？地球危

机下的政治宣言》，胡恩海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年，第235—238页。

作者简介：吴海朝（1996-），男，江苏扬州人，吉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研究。孔令昊（1996-），男，江苏扬州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亚史、隋唐五代史、环境人文学、知识史、人类学理论、科学哲学研究。